

#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 著名教育家戴伯韬

李 隆 庚



戴伯韬（1907·7·15——1981·3·6），曾用名戴邦杰、戴白韬，化名白征东、戴邦，笔名白桃、许宗实。生在江苏省丹阳县一个农民的家庭里。

### 第一次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幼年时上私塾读书，1918年11岁那年，考入丹阳县第二高等小学。他从小爱好学习，非常用功，每试常得第一名。1922年秋，考上了江苏镇江省立第六中学。平时喜欢在图书馆学习，不太爱体育活动，同学们都称他是个“小老夫子”。但他比较喜好音乐，爱吹箫、拉胡琴等，是学校国乐队的成员。

伯韬同志在学校时就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镇江后，镇江的工人、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他跟同学们积极参加街头宣传，抵制日货，到江边租界一带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口号，散发反帝传单。此外，他还参加到镇江街头、沪宁铁路火车上进行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

的爱国斗争，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1925年秋，他在父亲的劝告下，为毕业后便于就业，考入了商业专科学校，在那里学习两年后就转入晓庄师范就学。

### 探索改革旧教育的途径

有一天，伯韬从一份《乡教丛报》月刊上，看到陶行知先生想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培养新教师，改造旧中国，使中国富强起来。他看后很高兴，大约在1926年12月，他怀着一颗景慕之心到南京和平门外燕子矶一所乡村小学里会见了这位革命教育家。他向陶先生表示要考试乡村师范学校。陶先生高兴地说，好极了，你来参加，我们竭诚欢迎。我们试办这所学校是来试试改造中国的道路。伯韬同志在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为了探索改造旧教育、改造旧中国的途径，不顾家庭的反对，不怕冒当时北伐军正进攻南京的战争风险，于1927年3月，毅然离开了正在就读的商业专科学校，从镇江来到南京，参加晓庄师范的招生考试。那天他们只有十几个人，来到劳山脚下一个只有三、五家茅棚的晓庄村，在一块荒地上进行考试。考试的项目，是每人发给一把铁铤，进行开荒翻地。就这样，他考入了晓庄师范，成为晓庄师范的第一批学生。进晓庄不久，北伐军进攻南京，陶行知先生要学生组织救护队，迎接革命军。他和纬棨同志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子到尧化门外的京沪铁路沿线去救护难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他们参加省学联在乡下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的活动，把和平门外的土豪劣绅都逮了起来，有的公审后被枪决了，有的监禁了起来。伯韬同志在晓庄就读时，学生中已有一批共产党员在开展工作。他在地下党的帮助和影响下，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1928年秋，晓庄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担任乡村教育指导员，因他思想比较进步，学院院长怀疑他是共产党员，把他辞退了。后来他又到无锡惠山实验小学，为改革旧

教育继续进行实验。1930年初，他又回到晓庄，在陶行知先生指导下，筹办蟠龙教育学院（即民众教育学院）。

1930年3月初，十八艘日本军舰开进长江，在南京、安庆一带停泊，侵犯我国主权。蒋介石卖国政府对此不但不加抗议，反而表示欢迎，引起南京工人和广大群众的愤怒。那个时候，反动政府又镇压工人运动。为支援南京工人运动，晓庄师范师生参加抗日反蒋斗争。他们冲破警察的阻挠，到南京城里集会，游行示威。4月，国民党政府以“晓庄师范学校违背三民主义，散发反动传单，勾结反动军阀，企图破坏京沪交通”等罪名，派军队包围学校，进行搜查，尽管没有查到什么东西，也把学校查封了。学校被封后，晓庄学生开展了护校的斗争。伯韬同志同晓庄的一些同学在南京城里一些大中学校中进行宣传、讲演。还到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电影院内散发传单，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教育的罪行。他们这些活动，被国民党特务余仲篪侦察到了，反动政府把他们统统列入黑名单，进行通缉，晓庄师生纷纷四散躲避。伯韬等人逃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反动派的特务余仲篪追到上海来侦察、捉人。是年秋，陶行知先生被迫出国到日本。9月间，他们在上海呆不住了，伯韬同志被迫去浙江躲避，在江山县一所私立的何家山农业学校教书。为避人耳目，化名为白征东。约住了半年，在第二年春又潜回上海。

### 我国早期优秀的科普作家

1931年2月，伯韬同志从浙江回到上海后，开始了他的“笔墨生涯”。开始时，他办儿童半月刊、师范杂志，根据写现实暴露黑暗、引向光明、为理想而斗争的原则写童话、散文。同年夏，陶行知先生回到上海。他提倡“科学下嫁运动，以救国于危亡”。陶行知先生邀伯韬同志、董纯才同志等创办儿童“自然科学园”，编写、出版“儿童科学丛书”。1932

年，他们还创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伯韬同志从这时起开始钻研自然科学知识，和董纯才同志一起编写了小学自然科学课本，后又合编了农民常识读本。他们还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编了一套图文并茂的“大众科学丛书”，可惜后来没有能够出版。这期间，他同高士其同志等写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4年6月到1936年4月，伯韬同志就编写、出版了《显微镜》、《望远镜》、《雨、虹》等儿童科学丛书九种计十一本，在《生活教育》杂志上发表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六十六篇。他成为我国早期优秀的科普作家之一。

### 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地侵略中国，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使伯韬同志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高潮。“一二九”运动以后，各界抗日救国会纷纷成立，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伯韬同志去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党又派他参加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活动，并担任救国会组织委员会干事。这期间，他同陶行知先生和上海教职员工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担任理事，负责编辑《生活教育》半月刊杂志。《生活教育》提倡抗日，大量发表了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痛斥国民党卖国政府的宣言、文章、照片。把进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与抗日的政治教育联系起来。他后来办的《抗战教育》、《战时教育》杂志，更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的罪行，对广大民众进行爱国的抗日民主教育。使杂志为抗日的政治服务，将刊物办成为党宣传抗

日的阵地。这也就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不久，《生活教育》杂志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勒令停刊。

### 去武汉开辟新的战场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1937年9月，党组织决定从上海迁两个杂志到武汉去，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其中决定将《生活教育》杂志迁去。党组织派刘季平同志跟伯韬同志谈这件事。他听后，毫无二言，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同意将杂志迁往武汉。并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错误思潮，决定把《生活教育》杂志更名为《抗战教育》杂志。提出了以“集体主义自我教育”的口号，开展抗日救国运动。9月下旬，伯韬同志和季平同志奉组织之命转移去武汉。伯韬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在上海动身之前就开始了《抗战教育》的编辑工作。在从上海到武汉的路上，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下车进行宣传，找人谈话作调查研究。到武汉后，在汉口江汉路时代照相馆租了一层楼的两间小房间作办公室。10月上旬，《抗战教育》就出刊了。杂志出刊后，在武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来找的人特别多，真是门庭若市。那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因为季平同志还有党的其他重要工作，杂志方面全部工作，从写稿、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到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外出开会，都由他一人承担。他夜以继日，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也不知劳累。

伯韬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党的教育下，在共产党员王洞若等同志的帮助下，逐渐认识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看到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不可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认识到要使祖国科学昌明，人民过着幸福美好的民主生活，非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可，而这只有共产党才能办到。1936年，他通过党员王洞若同志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37年到武汉后，党组织根据伯韬同志的入党要求和实际

工作的表现，于同年10月正式接收了伯韬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同年底转为正式党员。在武汉时期，他能经常听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的报告，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政治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定。从此以后，伯韬同志的工作更加倍地努力，为实现党的事业奋斗了终生。

在武汉编辑出版的《抗战教育》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有了一个很好的群众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于1937年11月初，伯韬同志与刘季平同志发起组织成立了“抗战教育研究会”，伯韬同志任常务理事，实际工作负责会务。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大中小学校教师和大中学校的学生中开展抗日的宣传教育。研究会成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的一个重要组织，有很雄厚的群众基础，为党开展工作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群众条件。那时候，董必武同志来到武汉，恢复了湖北省工委，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党决定利用教育研究会掩护党的“工人工作委员会”来开展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伯韬同志坚决执行党的这一决议，他和一些同志立即在教育研究会里成立了“工人工作委员会”，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这实际上是党的一个工作机构。为了开展工人运动，他和一些同志到武昌武胜门外的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组织成立工人俱乐部，设立讲演站，对发展工人运动起了很大作用。这时期，伯韬同志还配合武汉办事处的同志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战时训练班”，为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干部。

1937年冬，教育研究会还联合了从上海撤退到武汉的职业教育社等十几个团体，发起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号召一发出，得到全国教师学生的热烈响应。伯韬同志被选为常务理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对发动群众、推动抗日救国运动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停发经费，迫使“教育研究会”停止活动。全国战时教育协会也自动解散。

武汉失守前夕，党组织决定他们进行疏散，一批同志去江苏青年工读服务团，一批同志去桂林，伯韬同志同另一些同志去重庆开辟新的工作。

从这时起，伯韬同志担任全国各界救国会代理事，党团领导小组成员。救国会代理事一直任到陶行知先生到重庆时为止。在这段时间内，他参加了救国会，召开许多研究如何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会议，对在全国各界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在救国会里负责联系教育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与陶行知先生联系，成为当时教育界抗日民主运动的实际负责人。

### 战斗在重庆的日子里

1938年9月，伯韬同志按照党的指示到达重庆，住在北碚，与钱俊瑞同志在一个党支部。伯韬同志到重庆后，将《抗战教育》改为《战时教育》杂志在重庆出版，杂志有时出旬刊，有时出半月刊。在广大师生中宣传抗日民主运动，开展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倒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斗争。那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国民党政府内除亲日派汪精卫等公开叛变外，顽固派也越来越走向反动。因此，在大中学校中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也愈来愈困难。国民党顽固派对报刊的出版发行控制很严，《战时教育》每刊都要送国民党报刊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但在伯韬同志等努力下，党的抗日主张仍旧通过杂志宣传出去，杂志还大量地报道了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鼓舞了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斗志。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一再迫害，1940年夏，《战时教育》被迫停刊。

《战时教育》停刊后，党组织决定派伯韬同志去延安，到延安大学工作。后来因陶行知先生留他任育才学校付校长，没

有去延安。在育才学校，党的一些工作，主要由伯韬同志去贯彻执行。他按照党的指示，在育才学校安排一批从各地来重庆的进步人士。他对工作勤勤恳恳，一点不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次痔疮非常厉害，行走和坐卧都很困难，钱俊瑞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劝他休息，但他仍坚持紧张的工作。因此积劳成疾，病倒了三个多月。

在重庆期间，伯韬同志除主编《战时教育》杂志外，还为生活书店编写了妇女教材、儿童教材和民众识字课本。宣传抗日、民主和科学知识。他还通过史良、李德全等有影响人士的社会关系，以儿童教育专家的身份，为“儿童保育院”编辑了一套保育院教材。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举世闻名的“皖南事变”，杀害了我新四军将士八千多人。在大后方国民党也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保护进步力量，周恩来副主席把伯韬同志找去，亲自向他布置把聚集在育才学校中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如艾青、贺绿汀、沙蒙、陈烟桥等迅速疏散。伯韬同志接受重任后，立即返回学校，同王洞若同志一起负责将这批同志转移疏散了，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不久，因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干部受到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伯韬同志，要他带一批干部去苏北补充突围后的新四军。伯韬同志接到通知后，把自己仅有的一个只有六岁的儿子交给了党组织（后来由组织帮助将孩子转移到延安保小），自己于1、2月间，和丁华、陆维特以及新安旅行团的一些同志绕道香港，经上海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

### 回到苏北解放区

1941年5月间，伯韬同志等到达苏北盐城西门外秦峙。这里当时是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伯韬同志到达根据地，好象回到了自己的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重庆

时受尽了国民党的欺压，心里气愤极了。一到根据地可以自由地呼吸，痛痛快快地工作了。他兴高采烈地穿起了军装，等待分配任务。到华中局报到后，分配到苏北盐阜地区工作。他先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中小学校去搞宣传教育。不到一个月，党又派他到华中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任科长。当时刘少奇同志指示让他积极准备召开苏北地区教育会议。伯韬同志为大会作了大量准备，由于日本侵略军开始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盐阜地区被分割成许多小块，教育会议才被迫停止召开。1941年9月，三师黄克诚同志派他去盐阜地区党委工作，后来盐阜区行政公署成立，伯韬同志任盐阜区公署文教处处长，盐阜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教育工作。主要负责恢复发展盐阜地区的中小学教育。当时有些地区把中小学校改为干部学校，把原有的中小学教育都挤掉了。盐阜地区在伯韬同志领导下，为了与国民党争夺青年，地区办起了联立中学（高中），各县成立了县立中学，恢复了原有的小学，同时还团结了一批教育界人士，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干部。当时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还编出了一套小学教材。此外他还狠抓了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工作。夏天办乘凉会，冬天农闲时办冬学。把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编成识字课本，进行教学，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对鼓舞农民参军参加减租减息起了积极作用，为盐阜地区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成绩显著，曾得到黄克诚同志的表扬。1942年，他在机关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盐阜地区与淮海地区合并，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会址设在淮阴。伯韬同志离开盐阜到淮阴任苏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第一厅厅长，主管民政和文教工作，在党内任区党委宣传委员。

1945年9月，日寇投降以后，我军进入两淮地区，10月，在淮阴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同志任边区政府主席，刘季平同志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伯韬同志任教育厅副厅长，兼

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当时因季平同志患病，实际工作都由伯韬同志全面负责，任务是恢复边区的教育工作，主要是抓解决中小学的教材问题。他亲自领导编委会，主持边区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6年9月开学时，已基本上编成了一套中小学教材。伯韬同志在主持编写这套教材工作中，他不仅注重教材贯彻政治思想教育，而且更强调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

### 调查研究入了门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猖狂地向苏皖边区进攻。边区政府向山东撤退。伯韬同志也随黄河大队撤至山东鲁南地区。1947年1月，苏皖边区政府及各专署县府的大批干部也撤到山东鲁南。华中分局决定成立华中行政干部学校。由季方同志任校长，伯韬同志任副校长。他们率二千多干部从鲁南撤至胶东。在5、6月间，大批干部分配了工作后，伯韬同志被派去山东教育厅帮助工作。

伯韬同志工作很注重实践，注重调查研究。1946年底，他利用从华中转移到山东后的一些空隙时间，亲自带领一个工作组到山东莒南县金沟官庄村作了二十天的调查，写出了《从一个村看解放区的文化建设》一书。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的情况，总结了农村开展文化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对推动解放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47年9月，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进行战略反攻，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胶东战役，把山东的敌人引向胶东加以歼灭。因为当时伯韬同志身体不好，组织决定由他率领一批干部和家属从胶东渡海撤至大连，可以病休一段时间。但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从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他到大连后，在病休时还帮助关东公署编了一套新教材。为了编好新教材，他建议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编写组的同志们根据他的建议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

后，终于弄清了这个地区长期被日寇统治，人们受到伪满奴化教育影响的情况。在编写教材时就有针对性地增加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提高学生主人翁的思想。这个时候，伯韬同志利用病休时间，还写了《调查研究入门》和反映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两本书。

### 留在山东工作

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徐特立同志主持编写全国国民教育教材。中央宣传部去电调伯韬同志到中央编写全国教材。他在赴石家庄途中经山东时，华东局经中央同意后，将他留在山东，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负责抓教育工作。当时山东的教育，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小学教育全部停顿。同时，有些地区在土地改革中没有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致使有的知识分子对党产生怀疑；教育行政干部也大部分转业改行；中小学的教材也都没有了。伯韬同志针对上述情况，一方面举办训练班，狠抓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的集训工作，很快组织起一支教育干部和教师的队伍，解决了干部不足和教师缺乏等困难。另一方面他狠抓了教材的编写工作，他亲自领导编写，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编出了一套中小学教材，使山东的教育事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济南解放后，他又到济南，帮助济南教育局恢复了教育工作。

### 接管上海市文教事业

1949年8月，华东局调伯韬同志到华东局宣传部任国民教育科科长。他到职后，积极组训干部，准备南下到上海接管文化教育事业。不久，他率一批干部随第三野战军过长江后，到达丹阳城外，在那里向陈毅同志汇报了准备接管的情况，确定了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办法，组织了接管队伍。1949年5月29日，伯韬同志同夏衍、范长江等同志率领接管队伍从

南翔随军进入上海，当天晚上住在交通大学的大教室里。伯韬同志到上海后，任上海市军管会文教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兼上海市市政教育处处长。第二天，陈毅同志在大光明电影院召开了上海市各界代表大会，宣布了我党的接管政策。根据中央先接管后改造、稳步前进的方针，伯韬同志领导文化接管队伍，接收了上海市文教系统各单位。当时，上海的学校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办的所谓公立学校，包括各种专业学校、中小学、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等；一类是受外资津贴的学校；另一类是私立的学校。伯韬同志遵照党的指示，对这些学校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首先全部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办的各种专业学校和中小学校。大约在一周左右都恢复了上课，稳定了人心。然后又组织力量改造了私立学校。对接受外资津贴的学校，执行了对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又团结广大师生员工的政策。这样使上海的半殖民地教育开始纳入了党的教育事业的轨道。接管这些学校后，伯韬同志又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多次召开了大中小学校教师座谈会，向他们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解决思想和生活问题，使大家安定下来。在整顿普通教育的同时，还大力发展职工业余教育和农民业余教育，培养了大批企业的领导骨干。到1952年，上海已初步建立了正规学校的基础。他为恢复整顿和发展上海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于伯韬同志在教育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1949年9月，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3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教育局局长、市教育局党组书记。195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在教育局领导“三反”、“五反”运动，后又领导对教师队伍的清理工作和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 主持统编全国教材

1953年，中央组织部根据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从各地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以编出一套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小学教材。1954年，伯韬同志从上海被调到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领导编写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根据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一套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指示。他首先抓了出版社的方针任务问题，明确了出版社的编辑方针和工作任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56年起，这套新教材相继编成并开始在全国各地使用。1958年开始，教育革命和教材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小学的学制试行十年制。伯韬同志根据上级指示，领导人教社的编辑人员着手编写一套十年制学校教材，并于1963年起相继完成。这样从1954年到1966年十二年内，他领导编写了两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此外，他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组织建设，为教育理论书籍的编辑出版，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筹建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培养一支教材编辑、教育研究队伍，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由于他对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成绩显著，1956年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64年又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2年至1966年间，他任中央教育部党组成员，兼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 顶妖风重建人教社

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人民教育出版社也横遭摧残。1969年全社工作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伯韬同志也同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那里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不久就得了冠心病，1971年几乎断送了生命。1971年人

教社被宣布撤销，编辑人员四散，编辑队伍被打乱。伯韬同志面对这种现实，象一根针扎在他的心头，非常痛苦。他深感十几年培养起来的一支编辑队伍要被拆散，一批多年积累起来的可贵的图书资料、文书档案将被毁掉。他为党的教育事业着想，从人民的利益考虑，不顾“四人帮”一伙的迫害和阻挠，1972年，直接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信，陈述教材工作的重要性和培养一支编辑出版队伍的不易。在周荣鑫同志的帮助下，将信送到了周总理的手里。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得到了新生。伯韬同志被调回北京领导筹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但在筹建人教社的过程中，为确定人教社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人员配备等问题，他与“四人帮”在科教组的骨干迟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迟群对筹建人教社百般刁难、阻挠，他对人教社的方针任务不定，对人员编制不给，使人教社无法开展工作。伯韬同志在万分气愤之下骂迟群是个“浑蛋”。为此，在1976年他又一次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致使他的冠心病愈来愈严重。

### 要写一本中国的教育学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伯韬同志无比兴奋。他以备受折磨之身躯，不顾自己病重，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教育事业拨乱反正忘我地工作。四年多来，他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重建、为新的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为课程教材如何为四化建设服务，始终带病坚持工作，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在这四年中，他为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为开展教育科学和开展课程、教材、教法研究，大声疾呼，先后写了三十六篇文章。此外，还写了纪念回忆文章五篇。1979年，他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由于他在教育界享有名望，1980年中国教育协会成立时被推选为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学会理事长。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伯韬同志拥护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中央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决策，主动提出退居二线，集中精力研究总结课程、教材方面的经验。他还计划编写一部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并为此作了大量的准备，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但不幸于1981年3月6日晨因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了。编写《教育学》一书成了他的未竟事业。

伯韬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为实现党的崇高事业，南征北战，几十年如一日，进行了无私无畏的斗争，艰苦奋斗了一生。他不愧是我党的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伯韬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领导教育事业，主持编辑了各类教材；在建国以后，又领导编辑了几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为我国摸索出了一套编写适应我国国情的教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逝世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 戴伯韬同志编著目录

### 一、著作目录

《儿童科学丛书》九种十一本

《从一个村看解放区的文化建设》

《调查研究入门》

《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

### 二、主持编辑的教材目录

妇女教材

民众识字教材

儿童保育教材一套

盐阜地区小学教材一套

苏皖边区中小学教材一套

关东公署中小学教材一套

山东省中小学教材一套

十二年制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一套

十年制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一套

### 三、主持编辑出版的杂志

《生活教育》杂志

## 阮氏文选楼刊《天一阁书目》的编者

关于阮氏文选楼刊《天一阁书目》（十卷）的编者，所见记载有三：孙殿起《贩书偶记》卷八等记为“范懋柱”；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第十四页记为“范钦”；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书藏目录》记为“范邦甸等”。

阮刊《天一阁书目》的编次年月，阮元在《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说：“余于嘉庆八、九年间命范氏后人登阁，分厨写编之，成目录一十卷。”清嘉庆八、九年间即公元1803年至1804年。考冯氏《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志传》所引“范氏谱”：范钦卒于明万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1585年10月20日），范懋柱卒于清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三日（1780年6月15日）。到《天一阁书目》编造之时，已是范钦死后二百多年，范懋柱死后二十余年了。可见陈说孙说均不对。不过，孙说倒有个起因，盖《天一阁书目》卷前“圣谕”二字下有“浙江巡抚臣阮元敬刊 宁波府鄞县学廩膳生员臣范懋柱恭录”两行字的缘故。这是书目中范懋柱与本书目编制似乎有点关系的唯一的地方。但对照阮元所言和“范氏谱”记载，“圣谕”（乾隆帝为编《四库全书》所下的圣旨）的“恭录”与本书目的编制也是两码事。

那么，冯说是否对呢？“范氏谱”（《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志传》所引）已言之凿凿：“懋柱长孙邦甸，字禹甫，号小愚，县学生。嘉庆八年奉浙江学政阮元之命，偕其族兄弟六人登阁，分厨写编书目，成目十卷。”即，阮氏文选楼所刊《天一阁书目》的编者应是“范邦甸等”。

• 鲍国强 •